

論中國哲學研究中華而不實的作風

——暨中國哲學研究的內卷及其克服

■ 蔡志棟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

本來想把題目定為「學術的內卷及其克服」，轉念一想，「學術」的範圍太大，自己所經營的只是中國哲學，甚至只是中國近現當代哲學，至於其他學科什麼情況，未必了解，因此還是保持謹慎為好。

關於內卷，有著極為嚴格的界定。指的是「在人多地少的客觀情況下，很容易導致越來越高的單位土地勞動投入和越來越低的邊際回報，從而形成一個比較頑固難變的封閉體系」，這個體系「甚至能夠抵禦、排除質變」^[1]。但是，在其流傳過程中，人們逐漸對其作出了廣義的理解，大體意思是說，圍繞著某一個領域或者對象，反復咀嚼、深度耕耘，結果卻不如人意，進步很少，很多情況下原地踏步。「為賦新詞

強說愁」，這句老話，點出了其精髓。如果是口香糖，也許早就一口吐在地上了，因為已經沒有了味道，而且粘口，煩人得很。可是因為人活著必須吃飯，必須從事某個行當——在本文中，必須從事中國哲學研究，便將前人說過的話反復的說。至於說

話的人有沒有覺得無聊，不得而知。也許，有的人還覺得津津有味，因為那是自己花了二十多年才學會的本領。人生又能有幾個二十年呢？這就形成了中國哲學研究中某些華而不實的作風。

中國哲學研究中，華而不實或者說內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研究對象的陳舊，還有一個方面是學術話語的陳舊。可稱為「兩個陳舊」。同時，中國哲學研究上的價值的迷茫，又為內卷做著注腳，既是其後果，又為其推波助瀾。

一、研究對象的內卷

先說第一個方面。所謂研究對象的陳舊，指的是自從有了中國哲學這門學科，百年來，關於中國哲學的研究對象雖然在具

體人物是哪幾個這個問題上，偶爾還會有爭論，但基本就是那些人，偶爾增減屈指可數的幾位。我們的老師輩的老師輩，因為進入這個行當的時候，筆路藍縷、一片荒蕪，因此可以比較方便的找某個人物作為研究對象，都有填補空白的功績。到我們老

摘要：中國哲學研究中華而不實的作風也即內卷，主要表現為研究對象和學術話語「兩個陳舊」。克服研究對象的陳舊，就既要發現出土文本，又要吸收文字化程度不高的材料作為哲學的研究對象。克服學術話語的陳舊，就要結合研究對象的更新，勇於突破前輩的研究方法，在對他們表達敬意的前提下，另闢蹊徑。此外，中國哲學研究上價值的迷茫既是內卷的結果，又為內卷推波助瀾，主要表現為「三個混亂」：把學術研究的客觀性、技術性和價值空無混淆起來；把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揚和復古主義混同起來；把學術研究對私人的效果和學術研究本身的價值等同起來。正視中國哲學研究中華而不實的作風，方可使中國哲學再次成為生命的學問。

關鍵詞：中國哲學；內卷；非文本材料；價值空無

師輩，研究對象基本上都被前人研究過了。這個時候，除去我接下來說的研究話語的轉變之外，他們的研究思路往往表現為不是研究個案，而是研究脈絡、專題、問題。但是，無疑，研究脈絡也好、專題也好、聚焦於問題意識也好，具體落實下來，還是要研究人物，而且，往往還是那些人物。

比如研究中國近現代哲學史的，當然會研究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王國維、章太炎、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這是以研究個案人物為中心。如果要研究中國近現代的非理性主義思潮，也會尋找這些人物身上的相關思想因素。比如高瑞泉教授的名作《天命的沒落——中國近代唯意志論思潮研究》，^[2]選擇的人物便包括了王國維、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如果說個案研究是從個案人物提出論點，那麼，專題研究的做法、寫法卻是先呈現觀點，再由個案人物來加以展示。楊國榮教授的著作《實證主義與中國近代哲學》^[3]研究的卻是中國近代實證主義思潮，在具體寫作方式上，也是落實為個案研究。這本著作包括了嚴復、王國維、馮友蘭、金岳霖等人物。

從學科發展的角度看，這是一個規律，也是必要的。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單純的個案研究和處於某種脈絡之中的個案研究，還是存在不同。個案研究以人物為主，需要考慮人物的方方面面，從他的生平到師承，從他的主要思想觀點到他的後世影響，不一而足；脈絡研究，或者更加精確的說法是，專題研究，甚至聚焦性極強的問題意識研究，卻管不了那麼多。究竟是注重某個人物的師承還是主要思想觀點，要看主題，也就是說，要看作者想幹什麼。專題研究必然是挂一漏萬的，甚至是一葉障目、見木不見林的。當然，我說的是從這個脈絡研究中涉及的個案的角度說是這樣，但是，從脈絡本身而言，卻是串珠成線、積線成面，有助於我們對某種現象從宏觀上有更全面的了解。

我曾經有一陣對專題研究腹誹得很。因為我認為，在個案研究沒有充分展開之前，對專題的研究必然是片面的。就像你沒有了解某個人，卻要把他列入某個宗族或者派別之中，豈不是本末倒置？但是，後來我轉變了觀念。這裡面涉及非常複雜的

原因。

一個原因是，事實上我們永無辦法做到對一個個案做出巨細無遺的研究，但是，對專題的研究又迫在眉睫，這個時候，必須先去做專題研究。

一個原因是，個案研究和專題研究處於良性的互動之中。我先前只看到了個案研究是專題研究的前提，沒有看到專題研究也可以促進個案研究。比如，就像我上文說的，對人物的歷史影響的研究無疑構成了個案研究的組成部分。而這個歷史影響，反過來看，也正是某種脈絡的雛形。比如對王陽明哲學的研究，如果局限於其自身，對他的全面性和深刻性的挖掘是會有限度的。但是，如果結合王門後學的發展，結合其左翼和右翼，甚至結合王學在中國近現代如何體現在各大著名思想家那裡，發揮了主體能動性的一面，那麼，我們對王學內在維度的理解和詮釋可以更加細緻，也更加正確。

然而，無論是哪種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實際上還是那些哲學家。差別在於，個案研究聚焦於個別哲學家，專題研究聚焦於一批哲學家，不同的專題研究聚焦於不同的哲學家（有時還是相同的哲學家）。就像搭積木，在不同的要求和期望下被搭成了不同的形狀。積木還是那些積木。

顯然，克服研究對象固化、內卷化的最直接的方法是，發現新的研究對象。

不能否認中國哲學界對此也是有明確意識的。這個意識也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發生的。促成研究對象發生變化的一個原因是，地下文本的不斷被發現。其實質是出現了新的研究人物，或者舊的研究人物的新的材料。比如《論語》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經典文本。海昏侯墓的挖掘發現了《齊論語》，無疑增加了研究《論語》、孔子、儒家的新材料。地下竹簡的不斷發現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地下材料的發掘，對於研究對象的合法性是不需要論證的。這大概是因為人們以古為貴。人們往往認為，誰要是研究《論語》那就是學問家；誰要是研究沾著泥巴味的材料，那就是高明的學問家。似乎以年代之久遠、材料之古舊作為了學問之深厚與否、思想深刻與否的標準。

雖然對於地下材料的哲學化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夠的。何況地下材料有限，一旦被發現就會成為某些部門、單位的獨門秘笈，輕易不肯示人。也許，這也是催生地下材料造假的一個學術化的理由（除去商人的經濟理由之外）。

於是，將目光投向一直流傳的，但其哲學化程度不高的材料成為了一個選項。這些材料也是平常可見的，但一般不是哲學史研究的對象，可能是文學史、甚至通俗文學史的研究對象，也可能是風俗史的研究對象。其特點就是隨時可見。多年前葛兆光教授主張的一般思想史、信仰史所指向的，就是這樣的材料。^[4]可見學界早已注意到研究的這個層面。不過，葛兆光教授供職於歷史系而不是哲學系，這就說明，哲學系的朋友還沒有把這視作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不僅如此，反而覺得不登大雅之堂，沒有嚼勁。似乎忘記了中國哲學的一個精髓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八寶樓臺當柴燒，究竟是樓臺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答案是自明的。但哲學界的朋友還是扭捏得很，不肯目光平視。之所以說是平視，而不是下視，因為他們是喜歡下視的，聚焦於地下文字材料就是一例。他們也是目光向上的，聚焦於所謂的精英人物就是一例。

這裡還需要強調的一個問題是，無論是地下材料還是流傳已久的一般材料，能夠作為研究對象的，有的人認為只能是文字材料。哲學處理的是思想，而且是理性化表達的思想，這樣的思想似乎只能以文字的方式表現出來。可是，這其實也是一個錯誤的觀點。將非文字的材料交給歷史系、繪畫系等專業的朋友，與其說是哲學系朋友的大方，不如說是懶惰加無能。當然，從整個學術體系的發展來說，因為哲學系的已經照顧了文字材料，而歷史系、繪畫系的照顧了非文字材料，所以還是互補的，大概並無多大缺陷。但就哲學系本身的工作而言，卻存在遺憾。

可見，新材料的發現和肯定是克服材料方面內卷的一個辦法。「發現」一詞容易理解，「肯定」一詞需要多做些解釋。它的意思是，材料已經在那裡了，但它們是否是哲學研究的對象，卻不是誰都能承認的。比如民國的中小學教科書，雖然有的研究者已經做出了精彩的哲學分析，但在有的研

究者那裡，卻仍被不屑一顧。當然，我無疑是主張這樣的材料也是哲學研究的材料的。目前，各種古籍比以往更加容易獲得，民國的報刊雜誌上的文獻也不需要像以往那樣在圖書館裡挖掘了，各種文獻的電子化程度極其高，覆蓋面廣，雖然對研究單位的財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需要花高價購買、開通許可權），但是，對哲學史的研究而言，也開闢更廣闊的領域，這一點也是無疑的。

同時，非文字材料作為哲學研究對象的身份也需要得到肯定和承認。再次強調，否認非文字材料的哲學研究對象的身份，當然可以是研究者的一家之言，但在總體上，這其實是自縛手腳，是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視野局限的表現。行文至此，就需要對中國哲學內卷化的另一個表現也就是研究方法的矮化做出論述了。

二、學術話語的內卷

無論材料是既定的還是可以被發現和肯定的，研究話語或者說主要是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都是重要的。

研究話語不僅僅是施展於研究對象的，就像刀施展於蛋糕一樣——而且，也是發現或肯定研究對象的：就像模具施展於月餅一樣。比如，在把哲學看作是理性化的思考和表達的方式的觀點的視野下，哲學的研究對象大概只能是文字性的材料。但這顯然是受到了研究方法的局限。如果我們拓寬研究手段，那麼，不僅文本材料，而且實物材料也能成為研究對象。這就大大增加了哲學研究對象的數量和品種。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的成果不是一回事，可惜很多人沒明白這個道理。

相對而言，在西方哲學那裡，分析哲學更加聚焦於文字材料，目前，絕大部分中國哲學的成果雖然在分析的細密度上不能和分析哲學相比，但其內在理路是一致的。

現象學的研究對象則寬泛很多。他面對一個杯子、一幅畫這樣的非文字的、甚至非文本的材料，都能進行哲學研究。哲學史上著名的例子就是梅隆·龐蒂。他發現使用現象學方法後，哲學家面對著杯子這樣的實物也能暢所欲言。當然，就目前

的形式而言，無論研究對象是文字材料還是非文字材料，最終形成的成果，基本上是文字性的，也就是說，是文章或者著作。哲學界很難接受行為藝術。好在還有藝術界能夠接受溢出了目前哲學界規矩的東西。這大概就是老話所說的「老天為你關上了門，他會為你打開一扇窗」。目前，中國哲學界也有少數學者採取現象學的方式關注非文字、乃至非文本的材料，這是需要肯定的。^[5]

研究方法的內卷的和研究對象的內卷還是存在不同。如果說後者的內卷表現為研究對象的陳舊，那麼，前者的內卷雖然也是表現為研究方法的陳舊，但這種陳舊卻是以創新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或者說，僅僅看其研究方法，我們甚至會覺得這是在創新，但是，如果聯繫研究對象的陳舊，那就會發現，那還是內卷，雖新無礙於其舊。

我並無興趣全面的回顧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歷史流變。只想對目前學界的兩個個案研究上顯現出來的研究方法的趨向略說幾句。

一個個案是莊子研究。莊子研究從來是熱點。哲學界如此，文學界也如此。然而，從「存在」（Dasein）的角度對莊子展開研究卻是近幾十年的事。在我們的老師輩那裡，「存在」的話語是時髦的，而且也是深刻的。那正是20世紀八十年代，存在主義湧入中國，為「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6]提供了思想的養料。莊子的心靈自由的特點最為契合這個思潮，也誕生了一批名作。比如後來在大陸屢次翻印的陳鼓應教授的《莊子今注今譯》^[7]，以及出版於21世紀，但其精神的起點卻是20世紀八十年代的楊國榮教授的《莊子的思想世界》^[8]。

然而，如果我們這一輩還是在說「存在」，那是否有點陳舊、不思進取了呢？

如果我們的學生輩也是在說「存在」，用「存在」來解讀莊子，而無論是對莊子文本的掌握，還是對「存在」話語資源的嫻熟，都存在問題，那是否是需要反思的？

另一個個案是孟子。孟子自從升格運動之後，也是一再成為研究熱點。如果說莊子突出的心靈自由的維度，孟子以其大無畏的氣概，在高揚人類的主體性、對專制制度的批判等方面都受到了褒揚。圍繞著他的性善論、仁政說、對道德主體性的

強調，中國哲學界誕生了海量的文獻。每年不知要產生多少篇研究孟子的碩士學位論文，還有不算少的博士學位論文。可是，關於孟子，這些論文又究竟說出了多少新東西呢？

這也罷。身為學生總要畢業，留來留去成冤家；身為學者總要寫文章，不寫不發就要扣績效；身為期刊總要發論文，不發論文那就是失職。也別說外審得到了高分，也別說得獎了，也別說被轉載了。外審作為程式，總要評分；評獎作為制度，總要給人獲獎；期刊轉載，那也是工作。

只是問問自己的良知，那真是好文章嗎？^[9]

其實這一切都不是問題。因為那就是工作。可是，如果一上來就說別人研究孟子的思路都是錯的，孟子其實想說什麼，就像今年（2021年）剛剛發表在滬上某著名學府學報上的某篇文章所說的那樣，那與其說讓人感慨後生可畏，長江後浪推前浪，不如說讓人感嘆中國哲學之內卷一至於斯。為了顯示創新度，不僅把別人對孟子性善論的觀點再次說一遍，而且指責別人都說錯了。

千萬別以為這只是某學報的神操作。在中國哲學界甚至哲學界的頂尖刊物上，類似的神作不絕如縷。還是說孟子。孟子的「在我者」和「在外者」的區分已然是學界常識。在我們的老師輩那裡也早已說了不知多少遍。沒想到，在21世紀過去20年之後的2021年，有的著名刊物還是刊發類似的文章。一上來也指責別人的解釋都錯了。可是，我發現除了把事情搞亂之外，該文沒有提供多少新見。也許搞亂本來已經很清楚的事情，也是對學術發展做出貢獻的方式。這幾乎是肯定的，因為為學界的繼續澄清提供了前提，功莫大焉。

如果做中國哲學做到了這種程度，那還不如躺平為妙。

提出克服學術話語、研究方法內卷的方法要困難很多。事實上，那些文章之所以造成了研究方法的內卷，一個原因恰恰是他們試圖克服以往研究方法的陳舊。但是，他們要麼不敢在研究方法上（有的時候甚至是研究對象！）「反叛」自己的老師輩，要麼因為研究對象的陳舊束縛了研究方法創新的努力，甚至使得在方法上的努力和突進變得可笑。

不過，這些論述本身也提供了研究話語、研究方法推陳出新的一條道路，那就是結合研究對象的更新，勇於突破前輩的研究方法；不是批評別人對莊子、孟子這些哲學界的老對象的研究都錯了，而是在對他們表達敬意的前提下，另闢蹊徑，由研究對象的翻轉帶動研究話語的更新。

或許，這是中國哲學再次成為生命的學問的一種可能方向。然而，目前中國哲學研究在價值上也是處於迷茫之中。

三、價值的懷疑

本質上，任何行當、任何專業本身都應該有價值的訴求。否則，為什麼會有人投身那個行當呢？當然，這個問題不應該被理解為，有的人的確是為了謀生而投身某個行當，有的人世世代代就在那個行當裡「乾飯」，這樣的現象不存在。這個反問，只是說，有的人會因為真心喜歡某個行當而投身到那個行當，不僅把它視作自己的飯碗，而且視作自己人生意義的寄託。

相對而言，中國哲學比其他任何行當都更需要價值的投射。不僅僅是因為哲學就其創立之初是「愛智慧」，既是知識，又涉及德性；而且，中國的學問，樁樁件件都要上關天道，下涉人事。

就我本人對中國哲學的認識而言，在我授課的過程中，一直試圖實現三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知識的傳授，第二個目標是思維的訓練，第三個目標則是價值的追求。雖然中國哲學的研究和中國哲學的教授多多少少還是存在一定的不同，但似乎也是可以類比的。知識的傳授，大概可以對應於研究對象本身的確立。思維的訓練，對學生而言是初步的、基本的哲學思維的訓練，大概可以對應於研究方法、學術話語的呈現。價值的追求對教授學生而言是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則是這樣的研究意圖傳達什麼樣的價值，作者要通過這樣的研究顯示什麼樣的價值觀。

如果說在研究對象和學術話語上，中國哲學的研究表現為「兩個陳舊」，那麼，在價值追求上，中國哲學的研究則表現為「三個混亂」。

第一個混亂是把學術研究的客觀性、技術性

和價值空無混淆起來。

最近三十年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個重大區別是，借用李澤厚的話說，就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10]。李澤厚說這番話的時候還是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其說法主要一種預測，是否其中包含著某種憂心忡忡？那便不得而知了。就其和劉再復的對話而言，他已經斷然「拒絕革命」了，所以，似乎他也是主張做學問家，不做思想家的。但是，拒絕革命不是拒絕啟蒙；拒絕革命恰恰是擁抱啟蒙。因此，我猜想即便是李澤厚先生，也是以一種擔憂的心態說出那番話的。意思是，因為個體選擇，還因為當時所呈現的客觀情況，學術界表現出了「學問家凸顯」的情態，這是需要注意的。

但是，最近二十多年來，李澤厚先生當時的預判變成了現實。這倒也沒什麼，本來，學術和木工一樣，也是一個有著自身技術要求的行當，其最初的目的也是養活一批人，並滿足社會需求。不過，肯定學術的技術性，也就是論文要有摘要、要有關鍵詞、寫作過程中不要抄襲、涉及他人的觀點要寫明出處等等這些繁瑣的要求，並不意味著學術在價值上是空無的。注意，我這裡特地避免使用「虛無」這個概念。因為這個概念具有特殊的含義。價值虛無本身也是價值。價值空無則是避免任何價值。

在這個問題上，或許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中提出的「崗位意識」^[11]值得注意。我認為，這個提法引發了價值空無的趨向。崗位意識就其初衷而言，意思是說知識份子要做好本職工作。就像木工要做好本職工作一樣。但是，這裡面包含著複雜的問題。

顯然，我們憑直覺就可以知道，知識份子和木匠還是略有不同。無論木匠如何盡職盡業，傳遞著積極的價值，但是，這些精神和價值是需要有人來提煉的。知識份子的身份則是雙重的，一方面他作為百工之一，也應該盡職盡業；另一方面，他是明確的價值的主張者。甚至有的知識份子由此產生了分裂：人格上的卑劣者，主張上的巨人。

複雜性不僅體現於此，還體現在，什麼是知識份子的崗位意識？一個不做好木工活而滿足於宣傳木工精神的木工，人們不會認為那是一個合

格的木工，但是，一個不認真上課，卻認真寫公眾號宣傳人文價值的中國哲學學者是不是在堅守他的崗位？我們的回答是，他只堅守了他的一半的崗位。這個回答是比較中性的。因為中國哲學學者的岗位要求顯然是比較豐富的。但是，就「崗位意識」這個概念提出的初衷而言，卻是勸誡學者放棄其人文關懷，並且天真的以為做好所謂的本職工作就會有人文價值。

這二十年來，我們看到大量的中國哲學成果誕生。但是，其中一些成果究竟有著什麼樣的人文關心，值得存疑。如果說早些年對價值的迴避是一種保護性的反應，那麼，近年來，有的人已經忘記了中國哲學研究還應該有價值關懷的。^[12]

第二個混亂是把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揚和復古主義混同起來。

中國哲學研究無疑會面對中國傳統文化。近幾年來，國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不遺餘力。請千萬注意我的措辭，我說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不是「中華傳統文化」。雖然我們會認為需要弘揚的無疑是優秀傳統文化而不是所有傳統文化，而且對何謂優秀本身存在著很大爭議，但有沒有強調這一點，還是不一樣。

我們看到，在社會上，中華傳統文化得到了事無巨細的弘揚，泥沙俱下。一次我外出，在街上看到一個寫著「國學館」的門面。仔細打量，才發現原來是一個麻將館。而「女德班」之類也打著傳播優秀傳統文化的旗號四處肆虐、斂財。其所謂的女德，根本不是現代文明的要求，而是三從四德，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了「裹三寸金蓮」的要求。

這些似乎與中國哲學研究無關，但它們至少從一個側面為我們理解中國哲學研究中出現的復古主義提供了注腳。中國哲學研究中的復古主義，包括但不限於對經學作高度推崇、但幾乎缺乏反思的研究。注意，我不是說所有的經學研究都是復古主義，事實上，近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出了一套叢書：「經史傳統與中國傳統哲學文庫」^[13]，主編張志強先生明確指出，對經學研究也包括了復述型和反思型。我們當然需要看到經史子集作為傳統學科門類的重要性。經無論如何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對象，但是，既然是研究，學術話語和

價值立場便十分重要。不能因為經是傳統文化的核心，而認定對它的研究便只能是注疏型的；差別在於，古人的注疏是文言文，今人的注疏是白話文，還會有英文摘要翻譯，規範得很。甚至還可以借此拿學位、得職稱。

中國哲學研究中復古主義的表現還包括有的學者提出的，把文化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等同起來。^[14]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文化保守主義，忽略了、否定了民族主義的多元性。^[15]事實上，如果承認民族主義的主幹是民族國家的話語，那麼，文化保守主義建立的只是傳統中國，對此，學界喜歡用帝國來稱呼之，它在民主主義革命中已經轟然倒塌；當前，中國的民族國家的話語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需要繼承發揚的，然而，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學術研究上，甚至延伸到國家建設層面，任何復古主義都在混淆視聽。

第三個混亂是把學術研究對私人的效果和學術研究本身的價值混同起來。

所謂私人效果，意思是學術研究的成果，發表於核心期刊、獲得獎項、結集出版、獲得課題資助，都會給研究者帶來名利，使之成為教授、博導，戴上各種人才帽子。有的人開玩笑說：學界這幾年，以祖國大好河山命名的人才、學者已經能夠把那些河山填滿了。上海有「浦江人才計劃」，山東有「泰山學者」，廣東有「珠江學者」。教育部還有「長江學者」等等。

學術研究帶來了令人艷羨的名和利，學術界儼然也是一個名利場。我們絕不否認這會產生競爭效應，推進學術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憑直覺發現，帽子人才和他所傳遞的價值之間並不同。如果說科學界有屠呦呦和顏寧，那麼中國哲學界難道沒有嗎？

我們也無意於去查查中國哲學界的屠呦呦在哪裡，我們最後或許只能無奈的說，一切問問良知吧。但，俗話又說：你的良知被狗吃了嗎？而中國哲學據說又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1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實踐智慧視野下的馮契哲學研究」（項目號：

19YJA720001)、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關係的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目號:19ZDA015)的階段性成果。

- [1]黃宗智：〈再論內卷化，兼論去內卷化〉，載《開放時代》2021年第1期。
- [2]高瑞泉：《天命的沒落——中國近代唯意志論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3]楊國榮：《實證主義與中國近代哲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 [4]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全三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 [5]有的研究者指出，胡塞爾現象學不僅首次為哲學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提供了新的研究對象。倪梁康：《心的秩序》(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說的也是這個意思。新方法既是方法，又是確定新對象的手段。
- [6]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載《人民日報》1979年5月7日第2版。
- [7]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
- [8]楊國榮：《莊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 [9]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良知是評價的最終依據。事實上，良知也具有極其個體性的一面。這就意味著，的確會有人認為自己的文章是很好的。老祖宗對此也早有認識，所謂「老婆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還有「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民間的智慧值得琢磨。
- [10]李澤厚：《對話集·九十年代》(中華書局，2014年版)。
- [11]陳思和：〈關於當代知識份子的崗位意識〉，載《文論報》1993年10月23日。
- [12]這裡需要補充的是，就價值關懷而言，上文提及的從存在論的角度對莊子的研究在這方面或許是值得稱道的。它的不足只在於話語陳舊，遠離時代，一定程度上也導致其對價值的追求墮入虛空。
- [13]張志強總主編：《經史傳統與中國哲學文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
- [14]方朝暉：〈文化保守主義是如何被民族主義綁架的〉，載《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2期。
- [15]蔡志棟：《個體的時代》(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20年版)，第170-186頁。

[16]早在2001年，哲學大家葉秀山先生就提出了要確立「純粹哲學」的任務，因為在有的人那裡，哲學變成了「學而優則仕」的敲門磚，變成了「投入市場」的本金。但其所謂的純粹哲學雖然自詡為「超越經驗」，而不是遠離經驗；然而還是有著不接地氣的嫌疑。葉秀山：《序「純粹哲學叢書」》，載倪梁康：《心的秩序》(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初版序言。學而優則仕或許值得懷疑，但問題的另一方面是，不能因此否定哲學應該面向經驗的，而且在學術話語、研究方法上也應該是自覺的。

On the Unrealistic Style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e Involution and Overcoming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Cai Zhidong(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ntruthful style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n other words, involutio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two outdated” fields, say research objects and academic discourses. To overcome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research object, we must not only discover the unearthed texts, but also absorb the materials with a low degree of literalization as the object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o overcome the staleness of academic discourse, we must combine the renewal of research objects, have the courage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our predecessors, and open up new ways on the premise of paying respect to them. In addition, the confusion of value in Chines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involution,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involutio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confusions”: the objectivity and technicality of academic research are confused with value emptiness; Inheritance of culture is confused with revivalism; the effect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private individuals is equated with the value of academic research itself. Only by facing the unrealistic research style of Chinese philosophy can Chinese philosophy become the knowledge of life again.

Key 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Involution, Non-textual Material, Value Emptiness